

80年前,当18岁的女地下党员高丰爱从八路军干部王一夫、于歧夫妇手里接过仅仅3个月的“小荣光”的时候,她也没想到,这个她用乳汁喂养大的孩子成了她一生的牵挂——

“我为八路军养育‘小荣光’”

□林新忠 李滢 刘洪民



97岁的高丰爱老人。



高丰爱的第三子在老宅旁回忆当年。

板门一笔,战止烟消。丧家犬,跳梁千里逃。晴光许我歌新宇,中朝谊,贯云霄。
短剑长矛,和平卫、血呈山国,壮行生死抛。浪平江阔思英烈,彭无畏,著风标。
——题记·献给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

“滴答答答答”“滴滴答答答”“滴滴滴答答”……
“这就是1、2、3……”

老人边说边在桌面上敲击着,娴熟的动作让我吃惊甚至有些诧异。

在这之前的交流,是片段式的回忆,还时断时续,影影绰绰的,但一提到“电报”这个话题时,老人的记忆仿佛一下子恢复了正常,那动作富有节奏,那敲击声煞是有力。

“电报”两个字,如同一条活蹦乱跳的鲢鱼,搅活了老人一生难以忘怀的话题。

老人名叫栾文人,现年93岁。他虽叫“文人”其实文化水平并不高,用他的话说“就是认识几个字”,而且老人是“行伍”之人,算得上是“武夫”了,更是与“文人”相去甚远。

老人“习武练兵”之地,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那是一座深山老林,高不可测,远不可量。老人说不出山林的名字,只记得那大山林里有个山洞。他在那里待了五个多月,留下了一生难以割舍的记忆。

那座山不在中国,而在一江之隔就能望见的邻邦朝鲜国内,那条江叫鸭绿江。

是的,他是一名抗美援朝的老兵,现居住在福山区臧家庄镇水道观村。

谁说时光不可以倒流?当老人的记忆被激活后,他清晰的思维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70年前的沧桑岁月。

老人是1949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入伍的。那时候还是栖霞县,不叫栖霞县,这也与他离休证上的“参加工作时间:1949年2月”相对应。我特意查了一下万年历,这一天公历是1949年2月13日。由此能够看出,老人的记忆非常准确。

当问及“为何要去当兵”时,老人激动但又很镇定地说:“我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那时,家里兄弟多的要带头报名,我家兄弟三人,我是村里第一个报名的……”

当时他是单亲家庭里的老大,已经是家里的“主心骨”了。他的两个兄弟,一个16虚岁,一个刚刚9虚岁,而他父亲就是在老三出生不久后因病离世的。十年来,他和母亲度日如年,将两个兄弟拉扯长大。母亲深知时局并不太平,外面的枪炮声似乎还能听到,但开明的她还是亲手将儿子送到了领兵人的手里。于是,他光荣地由“文人”变成了一名“武夫”。

老人清楚地记得,先在马陵家片区集结,然后转到黄县渤海军区,加入了剿匪大队队人民解放军第32军,并由此南下福建。

是的,194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胶东军区前方指挥部及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2军,隶属山东军区,“青即战役”后于1950年2月南下福建,执行以剿匪为主的海防、警备和作战任务。1950年11月第32军番号撤销,第94师调入27军,95师调归空军,96师组建铁道兵第7师。

与史料对应,老人在福建剿匪期间,正是美国对台的活跃期,第32军番号撤销前,抗美援朝的枪声已经打响。

老人没有出现在第一批次赴朝作战的部队中。他回忆

2023年9月15日 星期五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责任编辑/李凤/美术编辑/曲通春

“妈妈,我是海燕,您身体好吗?”
“荣光呀,好,我很好!”
“妈妈,您要保重身体,过段时间,我去看您!”
……

8月27日,在栖霞市桃村镇雀刘家村南果园边的一座安静的小院里,97岁的高丰爱老人正在与她远在北京的“女儿”王海燕通电话。清晨的阳光柔和地洒落在老人身上,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挂满微笑,写满幸福。

“打电话的是我的姐姐,是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妈妈给八路军抚养的孩子。”老人的儿子刘海军告诉我们,“妈妈一直喊她的小名‘荣光’,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则都喊她大姐。”

当年在胶东,为八路军抚养孩子的妇女,都被称作“乳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胶东大地曾涌现出无数名像高丰爱一样勇于献身、甘于奉献的“乳娘”,她们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没有人愿意冒风险去做这种事情。”高丰爱老人接过话茬说道,“但咱是党员,咱不去做谁去做!”

高丰爱一共生了6个孩子,1943年春,她的大女儿出生。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出生3个月的“小荣光”也被她妈妈送了过来,两个孩子一起吃高丰爱的奶。没几个月,大女儿生病去世,高丰爱便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小荣光”身上。“海燕姐姐一直在我家居住到7岁才被她的父母领走,这期间母亲一直没有生孩子,直到海燕姐姐回去以后才生了我的大姐刘海燕。”刘海军说。

“你的大姐怎么和北京的大姐一个名字?”我不解地问。
“是呀,她俩的名字一样。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也都是顺着大姐的名字起的,大姐叫刘海燕,二姐叫刘海花,大哥叫刘海林,我叫刘海军,我的两个弟弟分别叫刘海涛和刘海峰。”刘海军解释道。

“这都是我的主意。那年我大闺女生疹子,孩子白天哭晚上哭,哭得我的心都碎了。”好像听明白了我们的谈话,高丰爱插话说,“可又怕传染了‘小荣光’,我狠下心把大闺女送到了我婆婆那儿,谁知没过几天那孩子就不行了。”说起这些往事,高丰爱的眼角沁满泪水,不由地掏出小毛巾擦拭。她说:“我对俺男人说,那个孩子没有福,往后‘小荣光’就是咱的大闺女,再有孩子起名字就跟着‘小荣光’的大名起,名字里都要有个‘海’字。”

把孩子送给别人养,不是件随便的事,要反复斟酌。首先要刚生过孩子的人,有奶;再一个是必须是思想进步的人,要是党员,要么是村干部。那时,高丰爱虽然年轻,却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

高丰爱,1926年5月出生,16岁从娘家东下杓村嫁到十多里外的雀刘家村。就在家还沉浸在娶媳妇添新人的喜悦中时,人们发现这个文静可爱的小媳有点不对劲。别人家的新媳妇“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本本分分地在家做新媳妇,可刘家的儿媳却经常半夜往外跑,直到半宿才回来。

那时候,雀刘家村周边被称作栖霞的“小延安”,栖霞县政

一只不会打弯的手腕

——记抗美援朝老兵栾文人

□刘学刚



说,他也递交了请战申请,但没被批准,而是到了天津当时的华北军区第66军,成了一名电报报务员。

66军的前身是解放军华北野战部队第1纵队,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改编为第66军,1950年、1952年分别两次入朝作战,涌现了一系列光荣部队,例如“曲桥里阻击英雄营”“钢胆铁身战地英雄通信连”“铁血山英雄连”等。

我无法考究,老人是否就是“钢胆铁身战地英雄通信连”——66军197师师直通信营通信连中的一员,但66军的荣誉至少有他的一份。

在天津,老人接受了特殊的培训,不仅学习了无线电相关知识,还认得了26个英文字母。这正是当时的摩尔斯电码,数字、字母和标点符号结合的编码。此时也许正如老人所说,“可能真是因为我的名字叫‘文人’,认识几个字,才去了天津特殊训练,成了候补队员。”老人,一个有福气的兵……”

而说到“有福气的兵”时,明显有一种伤感的情绪涌上了

府就在雀刘家村西二里外的康家村。在这里的村村寨寨都驻扎着“胶东抗大”的部队,家家户户都住着八路军官兵,因此这里的村民思想进步,党组织发展迅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高丰爱秘密入党,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我刚嫁过来的时候,这里天天练兵。我和村里的几名年轻媳妇到军营里给战士们洗衣服。部队有纪律不让麻烦人民群众,战士们把脏衣服藏起来,我们就找床去搜,搜出来再洗。”高丰爱说。

高丰爱和丈夫结婚以后,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家里一共五间平房,高丰爱和公公婆婆住在西三间,东边则住着“抗大”的领导。屋后菜园里有一棵刺松,有时候勤务兵就爬到树上站岗瞭望。如今这棵已有百年树龄的老松树依然长青,可曾住在这里的人却一个个走了。

高丰爱给我们讲了当年发生的一个故事。高丰爱家从街门往屋里走要经过一个过道,过道顶上放着一袋花生种。有一年冬天,一个小勤务兵哭丧着脸找到高丰爱说:“大姐,我刚才把你家过道上盛花生种的麻袋给捅下来了,搁不上去了,你帮帮我吧。”高丰爱笑笑说:“没事,我帮你搁上去。”她找来凳子,帮小战士把花生搁了上去。原来小战士饿了,想用棍子捅几个花生吃,却不小心把一整袋花生给捅了下来。后来,小战士经常把部队里发的玉米饼子大块小块地送给高丰爱,以感谢她的包容。

那时候,党员都是在晚上开会,为了保密和安全,不是在远离村子的山沟里开就是在空地里开。有一次,上面通知她到康家村西沟那片莹盘去开会,她原本胆小,白天都不敢去莹盘,何况是晚上,但她还是壮着胆子去了。散会以后,她因为脚小跟不上趟,摔倒了,一不小心从一个高高的地堰上掉了下去,把脚脖子崴了,疼得她几乎是爬着回了家。

“我入党,公公婆婆都不知道,我男人也不知道。他们问我晚上都上哪去,我说到邻居大婶家耍了。”虽然婆婆不能肯定她是去参加党的活动了,但猜也猜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极力反对她晚上出去。为了参加会议,有时她只能偷偷地溜出去。“这一次回来得太晚,我在外面敲门,喊着爸爸妈妈,婆婆就是不给开门,最后还是从后窗爬进了家门。”高丰爱说,“我也理解我婆婆,她是想让我老老实实地做个老百姓。可咱成了党的人,就要听党的话,为党做事呀!”

至今高丰爱也不知道“小荣光”的父母是怎么选中她作为孩子“乳娘”的,当时她甚至不知道孩子的父亲和母亲是谁。后来她才知道,“小荣光”的父亲叫王一夫,那时候在胶东做党的地方工作,任过蓬莱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宣传股长、掖县县委委员、北海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等,母亲于歧则是胶东军区13团的卫生员,两个人转战南北,没时间带孩子,才托付给了高丰爱。

高丰爱斜倚在炕上的一条小薄被上,双腿盘起,坐着与我们聊天。临近百岁的老人,身体硬朗,耳不聋眼不花。她说话风趣幽默,偶尔蹦出一句话,让人笑得前仰后合,她自己也把眼笑成了一条线。

孩子送来的一幕,至今她仍记得清清楚楚,因为从那一天开始,她又多了一个孩子。高丰爱回忆说,“小荣光”刚来的时候,整夜地哭,她就抱着孩子满炕转,满地走。原来一个孩

子吃奶,现在两个孩子吃奶,生活本来就困难,地瓜干是主粮,玉米饼子几乎看不见,高丰爱的奶给“小荣光”吃了,自己的孩子就没奶吃。“咱是豁上命去养活呀,宁可苦着咱的孩子,也不能亏了八路军的孩子,不论吃什么都是先尽着她吃。”高丰爱说起来有些激动。

“小荣光”来了不长时问,高丰爱的孩子就生病去世了,她便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这个“小八路”的身上。那时候家里仅有5亩薄沙地,一年下来收获不了几个粮食,吃了上顿没下顿。由于生活不好,高丰爱的奶不够吃,婆婆就用仅有的一点白面烙小点心给孩子充饥。家里养了一只母鸡,下的鸡蛋全给“小荣光”吃了。即使是这样,还是发生了不测。有一天,“小荣光”突然不明就里地大哭,嘴角开始溃烂,急得高丰爱团团转。她让公公和丈夫抱着“小荣光”四处寻医问药,听说哪儿的医生好就抱着上哪去,最后跑到30多公里外的福山才知道这种怪病叫“干草虫病”,拿了药回来又吃又擦,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把病治好,至今王海燕的嘴角还留有当年生病时留下的伤疤。

其实,王海燕的亲奶奶就住在离雀刘家村二三里远的东杓村,但是她年岁已高,无法抚养那么小的孩子。她也想孩子,在“小荣光”三四岁后,经常把她领回东杓村住几天。然而,王海燕仍想着雀刘家村的妈妈,住不了几天就嚷着要回去。就这样一直到7岁离开栖霞,“小荣光”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高丰爱那里。

“小时候叫妈,大了叫干妈,现在又叫我妈妈,前几天还打电话问我身体情况呢!”说起“小荣光”,高丰爱一脸的自豪,“俺这个闺女没白养活,又给我寄钱,又领我去北京玩,常来看我,还给我买衣服呢!”听到这儿,旁边的大女儿刘海燕接过头茬说:“我大姐每次回栖霞都要来看我妈妈,上世纪90年代她把我妈妈接到北京住了10多天,亲自陪着妈妈把北京的好光景看了个遍。”

刘海军告诉我们,王海燕离开雀刘家后,先是随父母在烟台居住,后来又随父母工作调动到北京上学。20年前,王海燕从北京复兴医院退休,退休前是医院的业务骨干,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在高丰爱与王海燕通电话时,笔者也接电话,与王海燕聊了几句。王海燕听说我们的来意非常高兴,很快就打开了话匣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47年我四五岁的时候,国民党进烟台,妈妈(即高丰爱)是党员要带领部队家属转移,她最放心不下我,把我交给干奶奶时千叮万嘱咐,就怕出意外。后来我和干奶奶被敌人发现,被赶到村里帮他们做活。敌人走了,妈妈回来抱着我看了又看,问我怕不怕,问我吃没吃饭。”说到这里王海燕不由地哽咽了,“我妈妈对我比亲妈还亲,我也最愿意跟妈妈在一起。上高中的时候,从北京来到雀刘家村看望妈妈,印象最深的是妈妈给我烙小果子、做油饼吃。晚上我还和妈妈在一个被窝睡觉,后来我找了对象结了婚,还特意回来让妈妈看,让她把把关……”

刘海燕告诉我们,高丰爱之前还抚养过一位司令员的孩子。当被问及此事时,高丰爱说:“时间很短,我都没打‘单’。”我大体清楚老人家说的“没打单”的意思,就是不算数、没当回事的意思。其实当年在胶东乃至整个中国,还有无数位像高丰爱一样默默付出却不被人知的英雄母亲,我想正是因为她们,我们共和国的旗帜才会如此鲜艳、如此迎风招展!

前方指挥的需要。台长、编报员、译报员、报务员、马达员,各有分工,互不“串台”,各守各的“阵地”。

当时发电的马达由两人负责,马达是“苏联老哥提供的”。“苏联老哥”在老人的言语中格外亲切,他还特意给我作了一番解释,可见当时中苏的深厚感情。

“这个手术,也是由苏联专家给做的……”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老人的右手手腕原来是不能打弯的,五指功能正常,只是手腕是“死”的,僵直不能转动和弯曲,伤残等级为六级。老人说,这是在“山洞里”冻坏的,那时,战友们有冻坏耳朵、冻坏手脚的,还有晚上睡觉冻死的。而他的“福”就是右手冻坏后,无法工作,被迫回国治疗,才有了今天。

“这只手冻坏后,完全牵拉着,没有了筋骨,是在沈阳苏联老哥派来的专家给手术的,没有老哥的帮忙,可能手都保不住”“是从胯骨上取了一块骨头移植到手上的……”

是的,老人的手保住了,可这种“植骨固定手术”做完后,他的手腕再也不会打弯了……

此时影片《长津湖》的枪炮声在我耳边响起,冰雕雪塑的瞄准姿势浮现在我的眼前。

老人说,为了抵御严寒,他们时不时“强迫”自己运动,尤其是晚上睡觉,睡一会就爬起来活动一下。有些睡梦大的战士,就连连队干部踢屁股或者架起来强迫运动,否则,他们会在睡梦中冻死。

“老坐着不动,挨冻的滋味比子弹飞都可怕……”试想,零下三四十度,滴水成冰,那寒气绝对是钻心透骨的。老人的右手手指常冻结在报话机的金属连杆上面,右手背则是因为机械式的单动动作而冻伤的。随着时间的持续,冻伤的小疙瘩变成了脓包,最后脓血都流不出来了,因为外面冻上了一层厚厚的冰,手腕处则溃烂了一个大洞。

如此反反复复,直到有一天,老人发现自己弯下去的手掌再也抬不起来了,才知道冻伤已经恶化到了骨头。此时他的右手完全丧失了正常功能,不得已才被转移回国,先到了安东(丹东)医院接受治疗,没有效果,又转到了沈阳,接受了苏联医生为他做的手术。

“我是个福兵。”老人轻松的话语中带着些许戏谑,却苦涩得让我无法咀嚼。

是的,如果没有那次冻伤,他也许会在战场上坚持到最后的胜利,但也许也会像他说的那样“不知道死在哪里了”。

老人作为一名无线电报务员,虽不曾与敌人短兵相接,却和自己的战友以另一种方式冲锋陷阵,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电波”。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习近平总书记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如是说。

采访的那天,我碰巧赶上了臧家庄镇退伍军人服务站的三名志愿者为老人上门服务,这让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和敬佩。

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传承英雄精神,汲取磅礴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在此以诗致敬抗美援朝老兵栾文人——

青春十九离乡土,剿匪承平盼统归。
情融列强嗤齿舞,腰缠盟友红旗挥。
美帝电报强霜冻,难醒盟友手旗悲。
白雪山林铭岁月,一拳百世九州威。